

海外华侨的珍贵遗产

巴达维亚(雅加达)公馆档案简介 上

1背景

华人最早在爪哇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八世纪的唐朝,但是在西方殖民时代之前,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经商和生活的经历很少留下文字记录,即使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荷兰文的档案材料中涉及华人的史料也非常有限。1619年,战后的巴达维亚(简称吧城)亟待重建,东印度公司总督库恩以建设吧城和开展贸易为目的,不惜使用各种手段招揽数百名华人迁居到吧城。由于派往印度尼西亚的管理人员人数和能力有限,东印度公司效仿先前葡萄牙人在殖民地对侨民的管理方式,所谓的“以夷治夷,分而治之”的甲必丹制度来巩固其殖民统治。殖民当局强迫各族移民分别在划定的街区聚居,并指定该族首领进行管理,而所谓的“甲必丹”(荷文kapitein)即上尉,是以军衔命名的各族文职官员。占领雅加达数月后的1619年10月11日,针对四百多华人的社团,总督给颇有名望的华人苏鸣岗颁布了“临时首领”的委任状,由他管理华人内部事务,维持秩序,维护法规,处理一切华人民事,其余重大事务仍移交东印度公司来处理。

荷兰殖民者的意图是通过对华人官员的任命,将华人控制在他们自己的首领之下,以达到间接统治的目的。苏鸣岗成为荷兰统治下巴达维亚的第一位华人甲必丹,对兴建吧城和华人社会福利作出了很大的贡

献。而在华人社会中,人们常习惯地把在殖民地管理他们的不同级别的本族官员们都尊称为“甲必丹”。

2.吧城公馆

随着巴达维亚华人人口的增加,荷兰殖民政府为了加强管理,增设了“雷珍兰”(荷文luitenant,中尉)来辅助甲必丹工作,甲必丹和雷珍兰的人数也随着华人社会经济势力的扩大而增加。官员们定期开会议事,华人称之为“公馆”。巴达维亚的公馆也常被称为“吧国公堂”,是一个属于半官方性质的华人行政机构,是荷印政府间接统治和管理华人的工具。1740年“红溪惨案”发生后,荷印政府意识到要对殖民体制下的吧城华人进一步妥善管理的必要性,华人官员也因此获得更多的自治权限和社会地位,他们的职责也由原来的维持华人街区治安,处理华人内部民事纠纷及小型的刑事案件,征收人头税,增加到为殖民政府充当顾问,负责华人社会福利(如孤贫养济院,遗产局等),登记华人的婚姻、出生、死亡,处理华人街区事务,批准离婚,管理华人义家等等此外,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公馆还负责部分华文(传统的中文)教育,管理各类华人的寺庙。1742年,荷印总督命令甲必丹买一处房产作为公堂,即正式办事地点。由于日常事务繁忙,于1747年增设了一位秘书,即所谓的“朱葛礁”(荷文secretaris)

以辅助甲必丹和雷珍兰的公务。1837年,总督授予吧城首席华人甲必丹陈永元更高一级的官衔——“妈腰”(荷文majoor,少校)。从此,作为吧城首任华人妈腰,陈永元既是吧城华人社会首领,又是吧城公馆首席(主席)。

在十九世纪末之前,华人官员均属于无偿义务、业余任职,接受任命书甚至要缴纳几百甚至上千荷盾的费用,因此,这些华人官员本身都具备可观的经济实力。

“华人管理华人”的体制维持到二十世纪初,当时殖民政府迫于当地和国际形势,开始考虑重组统治各族“非白种人”的行政秩序。因为公馆不再适应新时代人们对平等的要求,华人公馆的官员们也因此不得不与其他华人社团分享他们的权力,从而失去了数百年来在华人社会中的显赫地位。虽然吧城公馆没有立刻被解散,但是在三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行政改革之后,它的权限仅剩管理土地和家地,为华人学校提供资助,以及管理寺庙等。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公馆的地产被没收,仅作为管理寺庙和家地的协会而继续存在。

3.吧城公馆档案

吧城公馆按照荷兰殖民当局的要求,在行政管理方面做了详尽的记录,同时也遵照华人的传统方式记载收入与支出、管理账簿。

不幸的是,这些档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公馆被撤销之后,

没有受到重视和妥善保管,甚至一度被遗忘,其中一部分被受到严重的损坏、被蛀书虫和老鼠咬噬而变得残缺不齐。尽管如此,幸存的档案涉及了该城市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华人社会大量有关人口、经济生活、法律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而且可以从中分析出公馆在上述时期权力变更的趋势。它们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

数码化的档案内容,其中包括646册大小不同的文献八万余页,55329张扫描图。少数1930年之后的零散马来文档案尚在整理编目中。

吧城公馆档案所涵盖的时间大约是1774年至1968年,其中以1900年前后为分界线,之前大部分的内容用中文记录,之后的书面语言以马来文为主,也有中文、荷兰文及少数英文。主要内容如下图表所示:

内容	时间	册数(页数)	语言	补充说明
(会议)通知簿	1879-1911	7册(956页)	中文	有缺失
通告簿	1877-1904	3册(541页)	中文	少量马来文注释
公案簿	1787-1791	28册(11608页)	中文	有缺失
	1824-1829			
	1832-1834			
	1843-1920			
公案簿	1909-1964	10册(2459页)	马来文	完整
公馆案牍	1847-1865	3册(1575页)	中文	有缺失
户口簿	1878-1884	16册(632页)	中文	有缺失
新客簿	1853-1913	4册(1024页)	中文	不完整
各式账簿	1838-1931	52册(3318页)	中文	格式多样
成婚注册簿(1)	1772-1913	69册(16751页)	中文	有缺失
成婚注册簿(2)	1913-1919	4册(598页)	中文与马来文对照	完整
家地登记簿	1811-1977	135册(20013页)	中文/马来文	格式多样
寺庙簿	1871-1968	46册(1516页)	中文/马来文	格式多样
学校	1934-1949	8册(82页)	中文/荷兰文	格式多样
土地、建筑许可和租税	1933-1941	6册(977页)	马来文	多散页
人口统计数据	1945-1949	9册(300页)	马来文	多散页
许可、证书	1850-1949	18册(9733页)	马来文/荷兰文	各种散页
教育(中文学校)	1932-1941	7册(2000页)	马来文/荷兰文/中文/英文	各种散页
未列入目录/扫描	1932-1963	未统计	马来文/荷兰文	各种散页

关于海外华人城市社会唯一保存下来的,系统的中文史料,是研究海外华人历史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现存的吧城公馆档案,其纸张重达600公斤,经过彻底地清洁、整理、修复和编目,保存于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其中大部分经过扫描后制成了胶卷和胶片,进行了数码化处理,并且已在该大学图书馆的网站上出版,供免费下载。读者可以在www.libraries.leiden.edu上点击“Catalogue”,再输入关键词“KongKoan”就可以在线查询所有已经被

4.公馆档案的重要性

吧城公馆档案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是因为它的持续性和系统性,而且在于它以华人社会为中心,从一个由内向外的视角反映出社会的问题和矛盾,以及华人自己的心声,还原当时的民俗风情、市井生活,而不是单纯地从荷兰殖民政府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问题。

档案中的十九世纪部分,在内容上比其他时期更加完整和充实。本文以十九世纪中期的文献为例,从中分析巴达维